



蔡继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 改革红利与城镇化

■蔡继明

今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在改革开放已历时35年的今天,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如果不尽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笼统地谈论改革恐怕意义不大了。

## 寻找最大的改革红利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政府要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今年1月5日,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李克强再次强调:要用改革的最大的红利让人民受益。这句话意义深远。

我国35年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问题是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目前我国的GDP和财政收入均名列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很多制造业产品也名列世界前茅,但老百姓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方面的压力和后顾之忧似乎并没有减轻,这说明改革的成果还应该更多地让广大人民分享。只有当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性,改革红利的增加和人民福利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

段,必然受到来自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干扰,所以改革既要勇气,同时也要善于妥协以减少阻力,也就是说,要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我觉得反腐败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左派不满意的改革,认为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右派觉得改革还不彻底。但是在反腐败问题上大家会达成共识,因为腐败和共产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水火不容,严重的腐败会威胁执政党的地位。对于老百姓来说,反腐败是最得人心的,能够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社会稳定。

反腐败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既有红利也有风险。红利得民心,但是肯定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习近平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谁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的笼子是谁制定、执行、监督?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要有权力的制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可以做到三权分立。

## 发掘最大的发展潜力

如果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那么,城镇化则是发展的最大潜力,是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中共十八大指出:“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最终促进四化同步发展。”这新四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城镇化。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而我们的信

息化也不落后,但是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而农业现代化落后是由于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李克强近年来一直强调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强调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潜力,原因也就在于此。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居民的市民化,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我国目前城镇人口虽然已达到52.6%,但其中包括了2.3亿农民工,他们虽然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半年以上从而作为常住人口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和福利。所以我们要用17年时间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到2030年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使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达到65%。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市化率达到80%。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期,将有7亿农民变市民。正因为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 以改革红利实现城镇化

这些年我特别关心的是土地制度,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近10年中,我就土地问题写了30多个提案,故被媒体称为“土

地委员”。我国现有土地制度造成了征地范围过大,补偿标准过低,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因而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过多地依赖土地财政,不断征收农民的土地,城市面积不断扩大,然后用招、拍获得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来修建大马路、大广场这些大型的工程和建筑,但是另一方面又排斥农民进城落户,由此造成农村征地事件、城市拆迁事件、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导致城乡之间矛盾加剧,官民之间矛盾加剧。

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我认为首先要修改宪法,宪法里有一条是“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另一条说“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农民的土地”,当城市建设发展不是公共需要的时候,占用农民土地就是违反宪法,如果征地代表着农村的土地进入城市,就违反了宪法的另一条: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二律背反怎么解决?第一,彻底修改宪法,城市里的土地可以实行两种所有制,多元所有制。工业化要占用农民的土地怎么办?非公共利益不征收,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而且这也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第二,修改土地承包法、房地产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宅基地可以抵押获得抵押贷款,国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无偿续期,同时要取消城镇居民禁止到农村买房的限制。同时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管住耕地。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海波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复杂,这在加大政策需求的同时也加大了政策风险,如何降低政策风险、制定高质量的政策,必须学习和研究政策制定方法。

2011年8月,日本实施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期基本计划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一体化展开”。几乎同时,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中的为了政策的科学”工程(SciREX)。这个工程的启动,标志着国际上兴未艾的科技政策学开始了日本特色的实践。

## 科技政策学在日本的兴起

科技政策学在日本落地的直接起因是政策争论。2009年8月民主党大选获胜,9月上台执政,11月开始为第二年预算作准备的行政事业计划评估。评估的目的是加大行政事业的透明度,改变行政官僚把持预算分配的局面。当时的首相鸠山由纪夫为推进行政改革成立“行政刷新会议”,行政刷新会议具体负责行政事业计划的评估工作。

2010年3月11日行政刷新会议发表行政事业计划评估报告,提出以削减预算为基础的判断。其中,科学技术研发投入大幅减少,包括IPS细胞、超级计算机在内的尖端项目全部中枪。此举引发广泛而强烈的议论甚至批评,学术界、经济界、官僚界纷纷表示不解或不满,包括首相鸠山由纪夫、副首相菅直人在内的政府决策层也认为行政事业计划评估报告的自然需要重新考虑。这样大范围、多层面的政策争论,自然提出了政策制定的问题: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依据是充分的、合理的、真实的和完整的吗?

这种追问恰恰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科技政策学要回答的问题,当然科技政策学作为一门起步不到10年的学科或领域,还缺少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但是科技政策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指明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向。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界和美国科技政策研究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6年美国正式起步的科技政策学受到日本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不能忽视的是,日本从来不是一个照搬照抄的民族,任何引进都和本土知识结合,进行本土化改造。就科技政策学的本土预备而言,早在2001年,日本学术会议就提出“为了科学的科学”、“为了社会的科学”和“为了政策的科学”的主张,并在实践中予以坚持。

有了这样的理念和知识基础,在国际研究环境的影响下和国内现实需求的强烈召唤下,日本政府开始了科技政策学的探索。2010年8月2日,文部科学省对外透露,正在考虑从2011年度开始,在2到4个大学的研究院设置“为了政策的科学”的研究方向,针对事业性计划评估中出现的没能充分说明科学研究意义、缺少说理争论任何一方的证据的情况,逐个科学领域检验该领域对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对其他研究领域的影响,提升政府研发投资的战略价值。文部科学省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在政策领域活用“为了政策的科学”的研究成果。

## 日本科技政策学的特点

1.强烈的现实需求 和美国一样,日本科技政策学的诞生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一般而言,没有针对政权的竞争,很难有好的政策研究。好的政策研究,通常服务于政权竞争。2009年民主党当政以后,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有些措施对社会冲击较大,引起争议,直指政策出台的基础和依据,促使政策依据检验、政策制定方法研究等出现巨大需求,科技政策学应运而生。

2.较优的国内基础 政策研究在日本国内有较优的传统和基础。1994年5月出版的《政策科学的基础》是日本文部科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宫川公男经济学出身,曾任日本计划政策局局长,对数据和数据处理方法的科学性十分关注,《政策科学的基础》一书有大量篇幅讨论政策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998年11月政策科学研究所完成的《海外主要国家科技政策形成实施体制动向调查报告》是日本科技政策决策过程研究的代表作,该调查报告采用系统化的指标设计和对比的方法,深入比较、讨论了美、英、法、德、日等国家的科技政策决策体系,是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决策体系的典范。该项目的主持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泽化学出身,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入科技政策研究,非常重视系统科学方法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强调模型和数据。

3.项目顶层设计 科技政策学工程的5个子工程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推进体制准备”,即科技政策学工程推进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营。推进委员会在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局的支持下于2011年5月16日成立,共有9名委员,除一名来自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外,其余8名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明显的顾问和咨询性质。对于推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学科落地而言,这也是一个合适的安排。

4.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也是日本科技政策学工程的一个独立子工程,表达了日本对科技政策学的长远考虑。科技政策学是一个新兴领域,需要按照这个领域的需要设计人才培养路径和教育、培训内容,这方面的工作跟不上,科技政策学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个大大的问号。日本科技政策学工程中单独设立人才子工程,显然是要大力培养人才,在将来的政策制定中大力发挥科技政策学的作用。

## 思考与启示

1.抓住科技政策学发轫的时机,把我国的政策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我国实行的是协商民主制,不会出现政治团体间针锋相对的、大范围、长时间的政策争论,也就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借助大的政策争论推进政策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捕捉时机上下功夫,在政策内容上关注国内实际,在政策方法上善于利用海外研究动态,将其转化为推动我国政策研究的契机。

科技政策学是政策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我国大多数领域存在着政策依赖的惯性和惰性,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复杂,这在加大政策需求的同时也加大了政策风险,如何降低政策风险、制定高质量的政策,必须学习和研究政策制定方法。

2.以我为主,解决我国创新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科技政策学滥觞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都有颇具特色的实践。前面讨论了日本科技政策学的实践上注重顶层设计、注重人才培养的特点。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去年启动了科技政策学研究项目,项目的研究方案中包括我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如何发展课题。和日本科技政策学的情况相比,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以研究界推动为主,政策制定部门还没有明确的动作。科技政策学的宗旨就是“为了政策的科学”,没有政府部门的行动,科技政策学难以成长、壮大。政府部门在科技政策学方面的行动,可以更明确、更有力地主导科技政策学沿着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前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研究员)

# 日本科技政策学的实践与启示

■刘海波

纵观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生活方式放纵的人、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都不容易得到选民的信任。

# 美国人的家庭观念

■金宽

在世人眼里,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从家庭观念上来看,最近这些年来,美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国人个人选择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单身、单亲家庭、同性婚姻等等被传统观念认为难以接受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不再被视为异类。

然而,尽管有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美国人对家庭价值的信奉仍然坚定。在这个当初以清教价值观立国的地方,大多数人觉得传统的婚姻家庭才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这在美国历届总统大选中可见一斑。纵观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生活方式放纵的人、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都不容易得到选民的信任。例如,1952年民主党的艾德礼·史蒂文森竞选总统,人们听说太太主动与他离婚,史蒂文森的民调数字立即直线下跌。再比如,2011年印第安纳州人望极高的州长米奇·丹尼尔斯打算参选,媒体爆出他妻子曾经背弃家庭与他人结婚,数年后又回到他身边。这本来不是丹尼尔斯的过错,但却让他不得不退出选举。

正因为如此,在近年来的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都大打“夫人牌”,夫人们纷纷出马发表演说、拉选票,力图塑造自己丈夫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从而提升他们

在选民心目中的信任度。在上一届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各自的夫人都承担了重要角色——重新定位自己丈夫的形象,让他们看上去更具有亲和力。

罗姆尼的夫人安·罗姆尼在面向全国电视观众的讲话中,讲述了她眼中的罗姆尼:她回忆了两个人在结婚早年的生活,他们住在租来的地下室,五个儿子接连出生,夫妇两人分担家务;她讲到丈夫当初创业多么艰难,工作又是多么努力;讲到罗姆尼在创业成功之后如何帮助他人,如何承担社会义务;讲到她自己患上了严重的多发性硬化症之后罗姆尼如何对她百般呵护。“自从那个迷人的高个子青年人将我从我第一次会议上带回家之后已经过去47年。”安·罗姆尼深情地说,“这是美国需要的人。这个每天醒来之后就会决心去解决他人无法对付的问题的人。这个人会比其他人更努力地工作,让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容易一些。”“作为妻子、母亲、祖母、美国人,我在这里保证:这个人不会失败。这个人不会让我们失望。这个人将会让美国兴旺!”听了安·罗姆尼的演讲,台下不少妇女纷纷抹起了眼泪。安的讲话一结束,罗姆尼就适时登台,给了妻子一个深情的拥

抱,会场上即时欢声雷动。

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斯维尔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在演讲中是这样说的:“我爱的就是巴克这个人。即便是他在巴克是个参议员与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对于我,他仍然是那个开着那辆破车来接我去约会的那个人。那辆车如此之破,以至于我能够坐在座位旁的一个洞中看到路面。他还是那个他为之最骄傲的财产就是从垃圾堆里捡到的一张茶几的人,那个只有一双小了半个号码的像鞋子的人。”米歇尔的听众同样非常感动,在场也有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在竞选活动中,两位夫人比各自的丈夫讲得好,在选民中的得分也比她们的丈夫高。大多数选民头脑中的逻辑是:受到夫人表扬的丈夫更值得人们信任,也更具备当总统的资格。这一逻辑在美国的总统选举史上有鲜明的体现。

美国建国以来选出过44位总统,其中只有一位——1857年至1861年在位的詹姆斯·布坎南——是没有结过婚的单身汉,只有一位总统——1981年至1989年在位的罗纳德·里根——离过婚,另外有一位总统克林顿在任内出过绯闻。其他的总统,

无论婚姻的实际状况如何,在选民面前都会以高度负责的丈夫面貌出现。

在美国人看来,对配偶的选择,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总统候选人挑选什么样的配偶,折射出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如果这些观念与大多数选民不吻合或者不被他们接受,候选人就拿不到足够的选票。同时,选民也很清楚,总统的配偶对总统的决策有莫大的影响。候选人及其配偶不仅生活上夫妻,政治上也是搭档。

近年来,美国人对政治人物特别是总统个人生活的挑剔越来越多,媒体对此也越来越关注。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心理原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自由度增加,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脆弱,个人的孤独感也在上升。所以,生活在如今这个年代的美国人,要从他们选出的总统那里看到梦想的实现。选民对第一家庭的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从穿着到举止,从日常生活到外出度假,无一不遭到各路媒体显微镜般的曝光。由此可见,美国人对于白宫家庭的期望,以及美国人对于家庭的价值观念。

(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从心理学上来讲,梦的意义就是激发作用,一个真正的中国梦也可以激发中国人前进。

# 中国梦的历史变迁

■朱建军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做的梦或是关于中国的梦。更扩大一层可以说,所有中国人做的梦就是中国梦。

从远古到现在,中国人大致都做过一些什么梦呢?最早的,而且比较靠得住的是孔子的梦。孔子在70岁左右的时候跟他的弟子说“我现在已经很老了,很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了”。由此可见孔子是经常梦见周公的。周公对孔子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周公象征着一周——周朝,周公代表着周朝这样一个理想的时代,意味着一种更好的政治,更好的文化,更好的生活方式。有这个梦作支撑,孔子一生努力传播儒家思想,希望实现周公所象征的这样一个梦。孔子的周公梦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也是最早的一个梦。

孔子关于礼乐制文明社会的梦想被秦始皇打破。秦始皇的梦不是孔子那种智者之梦,而是征服者之梦。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他在历史上成功了。尽管秦朝只传了三世就亡国,但它在中国文化中烙下了一个新的梦的痕迹,成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基因,中国人从此有了一个梦可以

做,就是征服者之梦。中国梦的最早源头就是孔子的周公之梦和秦始皇的征服者之梦。

桃花源之梦是中国文化中第三个重要的梦。桃花源这个梦从心理分析上来说有什么象征意义呢?这个梦是退行的象征,表达了回到母体子宫中的愿望,因为子宫是最幸福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吃穿不愁,没有忧虑。这个梦意味着人们想要回到秦以前的时代,因为秦以后的时代人们的幸福感不如秦以前。虽然秦朝已经结束,但其特点保留下来,如果启超先生说“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皆秦政,皆大盗也”。桃花源之梦中有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基本梦想——小富,有天伦之乐。

此外历史上还有诸葛亮之梦,他的梦代表了读书人的梦想:可能出身贫寒,但是读了很多书,有才华,碰到贤明的君主,就辅佐他建功立业。这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共同的梦。

到近代以后中国人的梦就变成了噩梦。因为中国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时候一个新的梦形成了,就是强国梦。但这个梦是一

个焦虑的梦。天天努力想强国不一定能强国,太激烈的强国梦会导致没有耐心,越着急就越容易做错事,越容易做错事速度就越慢。1949年之后我国提出赶超英美,开始说15年超过英美,后来觉得太长了,改为5年超过英美,结果到现在60年了,我们还没有超过英美。因此这个强国梦是一个很焦虑很紧张之梦。

当今世界公认的强国是美国,美国梦是什么样的梦呢?美国梦有一个最基本的格式: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敢想敢干,并且遵守了成功学的法则,最后变成了成功者。美国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去奋斗,最后成为了世界强国。相比之下,我们近代的强国梦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只是一个补偿性的梦,并不是一个真正有实现价值、有实现路径的好梦。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可实现的梦。

梦想能够感染人,激发人的潜能,推动人继续奋斗。所以,梦想非常重要,没有梦想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做不成事。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从心理学上来讲,梦的意义就是激发作用,美国梦可以激发

美国人去奋斗,一个真正的中国梦也可以激发中国人前进。所以有一个好梦是非常重要的。好梦需要去编织。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有一个著名的演讲——I have a dream,这是编得很好的一个梦。第一,方向很好;第二,有足够的细节;第三,离现实并不遥远但又不是非常具体,所以好梦应该不具体,象征化但是有细节,而且有一个好的结构。

而且,真正有效的民族梦、国家梦,不能被指定,其特点是先有一群人开始编织这个梦,然后其他人一起来丰富这个梦,最后成为大家共同的梦想。现在我们所缺少的是在社会潜意识的层面上,人们慢慢相互碰撞逐渐形成的一个梦,之后也许由伟大的艺术家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影响更大范围的人,直到全体民众都在潜意识中有了这个梦,那么这个梦在现实中就会有影响,人们就会慢慢实现它。只有形成这样一个中国梦,才有可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改变。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朱建军